

印度的中文和中國研究：回顧與展望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a Studies in Indi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

狄伯杰 (B. R. Deepak) *

一、前言

中國研究是多學科和科際整合的；它是在個人和集體的層次上，體制化的學術探詢與心智啟迪。它從不同層面，提供對中國的整體理解，語言即為其一。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和政治舞臺的影響漸增，中國研究、特別是中文的學習，在印度和世界各地已勢不可擋。出於諸多政治與經濟的原因，相較於西方國家，中國研究在印度是相對晚近的現象。這使印度的中國研究長期以來有所偏重；這一片面發展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因為我們的中國專家中缺少真正的語言專業。所有研究者都承認且強調，語言能力在區域研究中非常重要；語言知識所直接影響的，是研究者能否有深度、準確和客觀地理解一個國家及其文明。為了評估印度的中文和中國研究的現況，我們勢必得訴諸歷史，考察它們的發展與離合，以及它們如何在不同處境中自我申說。

二、開端與發展趨勢

印度最早的中文課程見於 1918 年的加爾各答大學 (Calcutta University)。這些課程很顯然是為了更了解中國而出現的，因為在孫逸仙 (1866-1925) 領導的辛亥革

命以武力推翻清帝國 (1644-1911) 後，中國正以亞洲復興的象徵浮上檯面。印度的革命家和民族主義者如 Rash Behari Bose (1886-1945)、Baraktullah (1854-1927)、Surendra Mohan Bose、Lala Lajpat Rai (1865-1928) 等，都與孫逸仙和其他國民黨領袖建立了很強的聯繫。事實上，為了將亞洲國家的民族主義者置諸一堂，亞洲和親會早於 1907 年便已在東京正式成立。¹

可惜的是，因為學生不足，加爾各答大學的課程被迫中止。以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於 1924 年不盡人意的中國行，和他本人對中國的興趣為背景，他於 1921 年在和平之鄉 (Shantiniketan) 成立的國際大學 (Vishva Bharati University) 裡開設了中國研究課程。Manoranjan Mohanty 教授稱此種種欲在印度探索、加強中國研究的筆路藍縷為「運動」(movements)。²據他所言，印度國際關係學院 (Ind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IS) 的成立 (1955) 標誌了第二次運動。這個機構由尼赫魯 (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 發端，並得到 Kunzru (1887-1978) 和 Appadorai (1902-1990) 教授等人的幫助，旨在從印度觀點出發，強化對國際事務的研究。印度國際關係學院隨即被併入尼赫魯大學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JNU, 以下簡稱尼大)，並自此以降與 Manoranjan Mohanty 教授所稱的其他嘗

* 作者為印度尼赫魯大學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中國和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譯者傅揚為英國劍橋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1 B. R. Deepak, *India and Chin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New Delhi: APH Publishers, 2001).

2 Manoranjan Mohanty,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a Studies in India," in AAS One-Day Workshop on "China Studies in India," India Habitat Center, New Delhi, 6th March, 2008.

試和運動迥不相侔，特別是在尼大語言學院（School of Languages）下獨立的中國和東南亞研究中心（Centre of the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CSEAS）成立之後。第三個是得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之助的德里大學運動（Delhi University, DU, 以下簡稱德大）。第四個運動，是以得到外交部（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幫助，於1991年成立的中國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ICS）的形式出現。我則想進一步指出，2009年以來可視作第五個運動，因為從這年開始，印度政府決定在每一省（state）開設至少一所的國立大學。

（一）第一階段

如上所述，和平之鄉運動是泰戈爾以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為基礎所創設的。在學院草創之初，法國東方學家烈維（Sylvain Lévi, 1863-1935）的到來，標誌著中國研究的發端。但得等到泰戈爾和譚雲山教授（1898-1983）在1927年會晤之後，這個計畫才得以最終成形和制度化。譚雲山教授於1928年來和平之鄉，全心全意地奉獻於建立、強化印度的中國研究，直至1983年辭世。關於譚教授對和平之鄉中國研究系的貢獻，和平之鄉的中文教授 Artatrana Nayak 有過以下觀察：

首先，他透過自己的人際網絡，從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得到大量資金，籌建了中國學院大樓。其次，他從各種資料中，不辭勞苦地整理出大量古典中國研究的材料。這些材料對任何研究都有根本的重要性，而他將它們全都帶到了中國學院。第三，他邀請許多致力於中印文化教研的中國學者和教師到和平之鄉。第四，他發行《中印研究》（*Sino-Indian Studies*）期刊以流通學者們的研究著述。³

我想指出譚教授的另一貢獻：他筆耕甚勤，不僅發表在印度的刊物和媒體上，還見於當時中國的頂尖研究刊物，如《東方雜誌》，也因此將印度自由運動及其領軍人物介紹給中國讀者。

根據 Mohanty 教授，和平之鄉運動見證了兩個極其重要的發展。⁴ 第一，它將重心放在語言和古代文獻研究。第二，它嘗試解析佛教文獻。就此二點而論，譚教授曾計劃將中文的佛教典籍，翻譯為其原始語言如梵文和其他印度語言，以此重建印度一些佚失的佛教文獻。他指出，在中國佛藏中，有超過五千冊佛典譯自梵文，其中絕大多數的梵文原本已佚失或不見蹤跡。⁵ 遺憾的是，譚教授的宏願仍未能實現。

無論如何，和平之鄉運動確實培養了印度最早且卓越的漢學家，如至今仍難有其匹的師覺月（P. C. Bagchi, 1898-1956）。

（二）第二階段

就印度的中國研究而言，1962年的中印邊界衝突可謂一分水嶺。這次衝突暴露了印度的許多弱點：除了軍事防禦能力，還有我們對中國、特別是其戰略與安全利益的膚淺理解。正因如此，1962年的大挫敗催生出一些新的機構，如尼赫魯促成的印度國際關係學院，及尼赫魯死後於1967年成立的尼赫魯大學。

1. 德里大學運動

在這個時期，福特基金會規劃了一全球戰略，在全世界資助、推廣中國研究。在草創階段，印度國際關係學院也得到了福特基金會的贊助。基金會不只資助教研項目，還提供獎學金供學生留學美國。印度國際關係學院最終成為尼大的一部分。德大最初在1964年創設了中國研究中心（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是一獨立研究中心；隨後在1968年，它更名為中國與日本研究系

3 Artatrana Nayak, "Rabinderanath Tagore and Visva-Bharati Cheena Bhavan: A Centre of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in Madhavi Thampi, ed., *Review of China Studies in India: A Colloquium* (New Delhi: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ccasional Studies, 2007), p. 35.

4 Manoranjan Mohanty,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a Studies in India."

5 Tan Yun-shan, ed., *Twenty Years of the Visva-Bharati Cheena Bhawan* (Shantiniketan: 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 of India, 1957), pp. 20-21.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Studies)，並成為大學組織架構下的一員。2003 年，該系進而更名為東亞系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Mohanty 教授指出了此運動的兩點特徵。首先，它引入區域研究的構想，其未明言的規劃是研究中國的政治文化、經濟、與對外政策。其次，區域研究的構想也被帶進中國語言、文學和哲學的研究，向美國的中國研究靠攏。德里運動培養了印度一些最知名的中國專家，包括享譽至今的 V. P. Dutt (中國研究中心的主要創設者)、譚中、Giri Deshinkar (1932-2000)、Mira Sinha Bhattacharya (1930-2009) 和 Manoranjan Mohanty (1942-)。這些專家多潛心於對外政策、戰略與安全、以及中國的農業問題。譚中教授 (任職於德大和尼大時) 可能是唯一一位仍持續和平之鄉運動傳統的學者。他最初是從區域研究立場探討中國歷史，但之後便潛心於中印文明對話。對此，譚教授於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國立藝術中心 (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of Arts, IGNCA) 任顧問教授及其後出版的一些著作值得一提，特別是《段文杰眼中的敦煌藝術》(1995)、《跨越喜馬拉雅鴻溝》(1998)、《追尋玄奘足跡》(2001)、《印度與中國：兩大文明的交往和激盪》(2006) 等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述。⁶

就結合區域研究和語言來說，早期的德大運動並未實現其目標。德大的文憑課程不足以提供進行研究所需的中文能力。然而，透過學生對中文的持久興趣，以及獎學金提供的至中國留學一、二年的機會，基礎的中文知識仍得以擴大與強化。

2. 尼赫魯大學運動

就印度的中國研究來說，尼大運動走了一條不同的發展路線。它與和平之鄉運動和德大運動都不一樣。

有別於結合區域研究和中國研究，它根據尼大的學院和研究中心架構，在兩個學院下建立了兩個不同而獨特的研究中心。國際關係學院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S) 編制下的許多研究中心，如東亞研究中心 (Centre of East Asian Studies, CEAS)、國際政治與裁軍研究中心 (Cent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Disarmament, CIPOD)，以及政治研究中心 (Centre of Political Studies, CPS)，都積極地發展中國研究。但這些中心所關注的仍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國防與安全。

這些中心的學者與研究員的語言能力仍有嚴重局限。不過，東亞研究中心的研究型碩士 (M. Phil) 可以嘗試透過中國和東南亞研究中心提供的兩學期中文課程來鞏固其語言能力；這是專為他們量身打造的。這一實驗並未獲得預期成果，但它還是幫助了許多領獎學金到中國強固其語言能力的學生。

其次，1970 年代初語言、文學暨文化研究學院 (School of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前身為 School of Languages) 編制下所成立的中國和東南亞研究中心，⁷毫無疑問地為尼大運動和印度的中國研究提供堅實的動力，因為中文學習和區域研究都能受惠於此。尼大課程的運作最初由 H. P. Ray 博士負責，稍後以降的許多年則交由譚中教授。Ray 博士充分地運用其語文能力，就 14 世紀印中貿易與外交進行不少研究，也廣泛翻譯中國歷史記載中有關印度和南亞的材料，部分著作包括《印度、東南亞與中國：若干歷史議題》(1999)、《印中關係中的東北印度及其未來在印度經濟中的角色》(2003)、《印度與中國的貿易與貿易路線：140BC 至 1500AD》(2003)、《中國文獻中的南亞史料翻譯》(2004，共 3 冊)。⁸

6 Chung Tan, *Dunhuang Art through the Eyes of Duan Wenjie* (New Delhi: 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Arts, 1994); *Across the Himala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New Delhi: 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 1998); *In the Footsteps of Xuanzang: Tan Yun-shan and India* (New Delhi: 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 1999); 譚中、耿引曾，〈印度與中國：兩大文明的交往和激盪〉(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7 在此之前為亞非語文中心 (Centre of Afro-Asian Languages) 和東亞語文中心 (Centre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8 H. P. Ray, *Chinese Sources of South Asian History in Translation: Data for Study of India-China Relation through Historical Records*, Vol. I, "2nd century BC Early to 6th Century AD" *Chinese Sources of South Asian History in Translation: Data for Study of India-China Relation through Historical Records* "Chinese Sources on Ancient Indian Geography," Vol. II; *Chinese Sources of South Asian History in Translation: Data for Study of India-China Relation through Historical Records* "The Buddhist Trilogy" Vol. III, publication of The Asiatic Society, Kolkata, 2004.

雖然中國和東南亞研究中心的課程重心是語言、文學、文化與文明，碩士階段的課程仍讓學者得以投入印中關係、政治、經濟、通俗文化等其他領域。儘管他們有機會匆匆一瞥社會科學、特別是理論，他們的長處還是其語言工具。上述 Ray 博士的著述說明了嫻熟中文所帶來的諸多優勢。筆者也盡可能廣泛地以中文為工具；讀者或許可從拙作中窺知一二，如《1904-2004 的印度與中國：百年和平與衝突》（2005）；《20 世紀前半葉的印中關係》（2001）；《漢印辭典》（2003）；《我與柯棣華》（2006，譯著）；《中國：農業、農村與農民》（2009）；《印中關係：文明的視野》（2012）；《印度與中國：未來展望》（2012）等。⁹

迄 2013 年，尼大的中國和東南亞研究中心已培養了 35 名完成碩士學位（MA）的學生。由於此中心的研究型碩士與博士學位始自 1993 年，至今只有三位在此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第一位是筆者的同班同學 Bagyalaxami，筆者則是第二人。此外，由於畢業生常能進入跨國公司（MNC）、待遇優渥，持續其研究者相當罕見。晚近出於加強中國研究和區域研究的考慮，中國和東南亞研究中心與東亞研究中心開始為彼此提供課程，以期相當程度地克服個別學程的不足之處。

（三）第三階段

根據 Mohanty 教授，1969 年中國研究小組（China Study Group, CSG）的成立標誌了第三階段的開始。¹⁰ 中國研究小組的成立，歸功於 G. P. Deshpande 教授（1938-1913），Giri Deshingkar 教授和 Mohanty 教授等人，以及新德里薩普魯之家（Sapru House）的在任和退休外交官的積極參與。這一研究小組可視為德大運動的擴展，

並透過與不同機構與組織的聯繫，至今仍常保活力。據 Mohanty 教授所言，這個運動背後的理念，是運用印度的公眾意見，催生關於中國的辯論。但這個階段也目睹了和平之鄉運動的蕭條。這個運動涉入新近中國研究和區域研究扞格的問題。針對中國研究和政治科學間的結構性鴻溝，試圖橋接二者的努力有所不足。此運動並未得到令人稱羨的支持。

就預期目標的實現，此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是成功的，因為它讓印度有相同關懷的人齊聚一堂，並最終為中國研究所（ICS）的建立打下基礎。然而，它未能處理中國研究和區域研究間的根本難題。置身此運動的學者中，儘管一些人有堪用的中文知識（working knowledge），只有極少數人具備做研究所所需的語言能力。

（四）第四階段

第四階段始於 1991 年中國研究所的創設。如前所述，這一變化將原先非正規的中國研究小組（CSG）正規化。此小組創辦的《中國述評》（*China Report*，印度唯一一份專以中國問題為對象的學術期刊）也由中國研究所接收發行。中國研究所集合德大與尼大的教員與研究人才、退休外交官，以及各領域、行業對中國有專業興趣的人。它也延續原先中國研究小組的週三研討班傳統。此外，中國研究所也舉辦定期的研討班、會議，推動研究計畫，以及參與學術交流。作為一個半政府機構，中國研究所也積極參與二軌外交（Track II），並和中國、俄國與日本的類似機構進行交流。它和中國一些頂尖機構簽署了合作備忘錄（MOU），包括北京的中國現代關係研究院、上海社會科學院、雲南社會科學院，以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9 *India and China 1904-2004: A Century of Peace and Conflict* (New Delhi: Manak Publishers, 2005); *India-China Relations during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New Delhi: APH Publishers, 2001) (Trans, edited and annotated). *My Life with Kotnis* (New Delhi: Manak Publishers, 2006), originally compiled by Xu Baojun and Narrated by Kotnis' wife Guo Qinglan under the title 《我與柯棣華》; *Chinese-Hindi Dictionary* (Chini-Hindi Shavda kosha); Central Hindi Directorat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and Development, New Delhi 2003, (Selection,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to Hindi and annotation); *Chinese Poetry: From 11th Century BC to 14th Century* Prakashan Sansthan, Delhi 2009;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Peasants*, Manak Publications, Delhi 2010; ed. *India-China Relations: Future Perspectives* (New Delhi: Vij Books, 2012); ed. *India-China Relations: A Civilizational Perspective* (New Delhi: Manak, 2012).

10 Manoranjan Mohanty,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a Studies in India."

中國研究所的成立見證了印度對中國研究的興趣有了快速成長。很明顯的是，對中國興趣的成長，歸功於友好的鄰邊關係，以及充滿活力的貿易、經濟、文化和人文交流。印中關係的整體發展也促成、加強學術在內的多層次交流，和中印雙邊學生至對方國家留學人數的增加。

（五）第五階段

近期中央政府為加強印度的中國研究，採取了一項措施，即在 2009 年的國立大學法案支持下，政府除果阿（Goa）以外尚無任何國立大學的每一省設了 16 所新的國立大學。其中如古查拉特國立大學（Central University of Gujarat）、馬哈拉施特拉省沃爾塔的聖雄甘地國際印度語大學（Mahatma Gandhi International Hindi University in Wardha, Maharashtra）、錫金大學（Sikkim University）、賈坎德國立大學（Jharkhand Central University）、德里的安貝卡大學（Ambedkar University, Delhi）、HNB 加爾瓦爾大學（Hemvati Nandan Bahuguna Gharwal）等，都設有中文的學士與研究生學位，並提供與區域研究有關的課程。一些學位設立條件尚未完全成熟的大學，則提供了證書課程（certificate）。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新大學的學位設計與結構是以尼大為範本。這當然有其優點；但它們也忽略了現存範本的不足之處。遺憾的是，在 24 所 2009 年以前成立的國立大學中，多數都未提供中文課程。

同樣應注意的是，國立大學實未能滿足已擴大的需求，許多省立和私立大學則起而填補這項不足。亞米堤大學（Amity University）和金德爾大學（Jindal University）可能是唯二為大學生、研究生和工商管理碩士（MBA）提供中文課程的私立大學。這個計畫得到臺灣清華大學設置的臺灣教育中心（TEC）的幫助。臺灣教育中心最近也與新德里國立伊斯蘭大學（Jamia Milia Islamia University in Delhi）簽署合作備忘錄，並選送兩名中文教師至該大學。中國大陸假手孔子學院進行的類似計畫迄今未見成果，即便尼大在 2005 年便與其簽署了第一份合作備忘錄。韋洛爾科技大學（Vell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也簽署了合作備忘錄，但即便它有數以百計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此合作計畫仍面臨困難。

此外，對在中國經商，以及任職於與中國、香港、臺灣有經貿往來的企業的人來說，印度國內眾多研究

所和商學院也能回應他們的需求，例如 JK 商學院（JK Business School, Gurgaon）、德里的綠色公園華語中心（The Chinese Language Institute in Green Park, New Delhi）、班加羅爾的威度席學院（Vidushi Academy, Bangalore）、印中工商會（Ind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等院所。印度的許多高等學院（schools and colleges）也提供中文課程；就我所知，在德里最為成功的是印度知識之屋（Bhartiya Vidya Bhawan）高中學校。為應對中文師資短缺的情況，許多私立研究所從中國大陸聘請師資。但即便這些研究所和大學有熱情與動力，學生的素質還是一大隱憂。印度將會在所有印度中等教育中央委員會（Central Board of Secondary Education, 簡稱 CBSE）下的院校提供中文課程云云，至今未見起步；而考慮到印中之間的政治信任和中文專業的不足，此願景仍不易實現。

除了大學，印中關係正常化後如雨後春筍成立的許多機構也涉及中國研究，包括中國研究所、國防研究暨分析中心（Institute of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es, IDSA）、和平與衝突研究所（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IPCS）、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CPR）、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ORF），以及替代政策中心（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CPA）。此外，1943 年成立的印度世界事務理事會（ICWA）最近也著手並強調中國研究。這些單位的研究侷限於印中關係、有關印中經濟的諸多面向，以及如國防和安全等其他議題。

三、當下的中文與中國研究

當前，中文作為大學、研究生和博士培養的學科，其教學與研究主要由尼赫魯大學、國際大學、貝拿勒斯印度大學（Banaras Hindu University）和杜恩大學（Doon University）承擔。除了杜恩，這些大學也被視作在研究生和博士階段深造中國研究的首要機構。此外，德里大學、旁遮普大學（Punjab University）和其他一些學校，可提供大學生和研究生一或二年的中文文憑、證書課程。德大同時也是欲進入研究所、博士班深造中國研究的主要去處。

（一）尼赫魯大學

中文作為一門學科進入尼大，始於 1973 年。論及中心成立後頭兩年的命運，Ray 博士回憶道，尼大的整個中文學程「曾難以為繼」：

唯一的中文教師 Tsai Hansheng 先生，因部分學生惹出的麻煩而離去。只剩我跟同僚 Vimla Saran（1930-1991）小姐在維持這個學程……沒有大陸或海外華人願意來這兒；德里大學也沒有師資。我們得不斷奔走，從印度廣播電臺（AIR）和內閣秘書處（Cabinet Secretariat）找兼職教師。¹¹

四十年後的今天，尼大的中國和東南亞研究中心已成為在印度學習中文，以及從事中國語言、文學、文明和其他相關區域研究課題的最佳研究中心之一。在 1970 年代後期，譚中教授和 Yap Rehman 教授的加入強化了此中心。自此以降，中國和東南亞研究中心已培養出 35 屆研究生，並有許多傑出學生加入教員行列。

就中心提供的課程而言，新生和二年級生的首要訓練是培養語言技能，如聽力、口說、閱讀和理解能力。他們也有機會接觸少量的文言文詩歌、散文。當我在尼大學中文時，我們有一文言文選讀的課本；但它現在已被其他書籍取代，旨在增強學生的溝通技能。如此一來，在這個階段，文本的賞析和批評被束之高閣。相當程度上，這是難以避免的，因為賞析和批評需要相當水平的語言能力，而學生在大學階段往往無法習得相應的能力。透過主要是現代的作品摘錄以速覽中國文化與文明，支配了文本學習的教學，特別在大學部學程的最後一年。不過，大學部的其他課程，也有機會讓學生接觸文言文文本。例如在作文的課上，我會介紹文言文詩歌、散文的文本，討論其記述、賞析與批評；學生們對此相當感興趣。

大學生有一門綜合性的工具課（tool courses），旨在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化、文明、政治與經濟的興趣。然而，中心並未提供自己的選修課程，不易激發學生對中

國研究的興趣，也較難鞏固學生在工具課程習得的關於中國的知識。這些工具和選修課程是大學學位的畢業要求。中國和東南亞研究中心另一特殊之處是其評量體系：學期中有三次期中測驗，期末則有一次考試；三次測驗至少要有兩次合格，才能參加最後的期末考試。這種模式有助維持課程設計的活力並推陳出新。

在研究生階段，文本批評和賞析的課程主要有兩方面：文言文，以及現當代小說及短篇。毋庸諱言，我們沒有一個詮釋框架，難以有系統地解答一些問題，如文學文本怎樣幫助學生學習外語、文學如何影響語言學習者、這些影響的文化編碼、師生在外語教學時利用文本所可能碰到的問題等。換言之，我們亟需了解更多有關影響、語言、文學和文化的種種，並以此加強對語言學習的認識。

我們沒有專為在大學部學習中文的印度學生所設計的教材。對於研究生，筆者編寫了一部由中文原典組成的文言文教材。就文本性質和作者角度來說，我考量了許多因素，較重要者包括文本語言的難度、題材，學生的知識準備，和他們感興趣的程度；這些是我們中心挑選文學文本的指導原則。我們也時時留心讀者的理解能力：如果讀者能理解閱讀內容，他們將可在個人的層次對之做出回應甚或樂在其中。因此在選擇由中國學者編的教材時，各種因素如學生的語言能力、文本的語言難度、內容等都要考慮進去。

因此，中心設計了五年制的碩士學位，旨在培養學生進行研究所需具備的語言技能，並讓他們有機會接觸區域與文化研究。我們的學生即帶著此專門知識，進入研究型碩士和博士學程。儘管未能在大學部提供與區域研究有關的選修課程，師資缺乏也始終是一問題，中國和東南亞研究中心仍培養出不負所望和為數可觀的中國研究人才。

（二）國際大學

如前所述，國際大學的教學與研究重心是古典和佛教相關的漢學研究。相較於培養學生的相互溝通能力，

11 Haraprasad Ray, "Reminiscences and Suggestions," in Madhavi Thampi, ed., *Review of China Studies in India: A Colloquium*, p. 17.

這個現象更強調語法與翻譯上的精確。由於精確閱讀要求忠實地翻譯文本，它催生出實質且有深度的研究成果。然而，因為印中雙邊關係的惡化及後續的冷若冰霜，沒有後繼者能廣續國際大學的古典研究傳統。在邊界衝突後的近四十年內，它無法有效地吸引學生；外交關係的惡化確實對其古典研究傳統帶來重擊。

這一處境近來得以改善，重要原因在於，國際大學教學與研究的重心轉向發展溝通技巧和關注當代議題。此時此刻，該系有超過一百名的大學生、研究生和攻讀博士者。就課程綱要和設計來說，國際大學採用了類似尼大的教科書（至少大學部如此）。

不幸的是，國際大學教學與研究的初衷已不復見。中國學院最初的目標，是發揚中印文化交流，開展佛教與中印宗教、哲學、歷史與文學的研究。儘管他們不無復興古典研究的嘗試，考慮到研究古典傳統必須具備文言文的能力，能廣續者仍將屬鳳毛麟角。

（三）貝拿勒斯印度大學

儘管中文教學在貝拿勒斯印度大學（Banaras Hindu University, BHU. 以下簡稱貝大）有頗長的歷史，要到1980年代，該系開始提供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課程後，它才真正具備發展的動力。但在僅有三名專任教員的情況下，提升教學與研究水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Kamal Sheel教授所言，他們「負擔主要的教學活兒，每人每周有25至30小時的課」。¹²

關於課程設計，中文的學士學位要求學生在頭兩年中，每年須修習兩門課（papers）。到了第三年，他們必須在語言、文學到中國歷史、文化和思想的範圍中完成六門課。研究生階段的重點，則放在主要中文作家所寫的故事和詩歌，以此教授進階中文。同時，研究所學程也讓學生有機會發展專精的中國語言、文學或漢學研究。大學部和研究所都有文言文課程；針對外系學生，它也提供了文憑課程。

儘管教師常被教學負擔壓得喘不過氣，在研究方面，該系仍有一些足堪稱道的進展。Sheel教授如是云：

這些（進展）包括發行了一份亞洲研究的專業刊物、翻譯出版了兩部重要的漢文佛典，《阿毗達摩大毗婆沙論》和《阿毗達摩心論》，以及推出現代中國史與比較歷史的研究成果。學位論文的部分，出現了魯迅（1881-1936）作品中的女主角、《薄伽梵歌》與儒家，以及中、日文學中的幽默等題目。此外，也有一項強調比較視野，著重中印關係的研究。¹³

（四）德里大學

關於中文的教學，德大僅設立短期的證書或文憑課程，並不授予學位，因此，德大的中文教學和研究並不強。德大的區域研究差強人意，但因為缺乏語言知識，研究成果並不理想。

（五）其他

尚有其它四類機構提供中文課程：德里國防部外語學院（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FL, Delhi）；國立和省立大學的語言課；中國研究相關的智庫；以及前述第五階段揭櫫的私立機構。國防部外語學院提供的課程，主要是為從事國防事務者的需要而設計；教學方法仍以「語法翻譯」為主。因此，畢了業的學生往往不具備優異的溝通技能。在此接受訓練的人，他們的發音相當古怪，以至於幾乎不可能理解他們在說什麼。就現有情況來看，外語學院距達到目標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四、困難與課題

很清楚的是，在印度過去和現在的中國研究中，語言和區域研究間存在著扞格。研究者多半強調嫻熟中文

12 Kamal Sheel, "Chinese Studies at Varanasi and Indian Scholarship on China," in Madhavi Thampi, ed., *Review of China Studies in India: A Colloquium*, p. 23.

13 Kamal Sheel, "Chinese Studies at Varanasi and Indian Scholarship on China," p. 23.

能力的必要性，但此問題仍未能解決。許多難題造就了這一現象，如中國研究和區域研究的分立、缺乏包括中文圖書館資料庫在內的中文書目文獻、赴中國學習的補助和獎學金不足，以及語言的困難。

（一）中國研究和區域研究的結合

只要區域研究和中國研究沒有相結合，它們之間的扞格就會一直存在。儘管我們的大學允許我們從事跨學科研究，學生多偏好到區域研究外的其他學科攻讀較高學位，因為在印度，區域研究的就業前景仍相當有限。職是之故，語言專業的學生決不會搞區域研究。這並非孤立個案，因為誠如 Chakrabarti 教授所言，我們的大學學科仍不外乎是「印度中心或歐洲中心」。¹⁴ 在中國研究領域深造的學生，絕大多數來自國際關係、軍事、政治科學等學科；從歷史、社會學、經濟學、哲學、人類學、文學等領域加入者極為罕見。

不過，近年由於中國的經濟榮景和與之俱增的政治影響力，對中國研究有興趣的學生越來越多。有見於此，此問題或可從兩方面加以改善。首先，大學、至少頂尖大學，勢必得開設中國經濟、農業、鄉村發展、哲學、社會學等主題的課程。於此同時，中文應被設置成學生的必修課。至於主修中文的學生，學校可開設上述課程以為選修。此舉可望在語言和區域研究系所間建立健康、有益的合作關係，雙方都能著眼不同領域，推展不容或缺的印中比較研究。

（二）書目資源和中文圖書館資料庫

沒有異議的是，印度缺少進行實質和進階中國研究所需的書目資源，也缺乏有活力、能交流研究成果的知識環境。和平之鄉有極佳的佛教文獻資源，但它們已因為罕有修習文言文者而久染塵埃。文言文的重要性眾所皆知：不僅佛教經典，欲理解中國的二十四史、哲學和古代文獻，文言文是不可或缺的。

儘管尼大是在印度學習、研究中文的最佳選擇之一，就館藏的中文歷史、語言、文學材料，和其他中國相關學科的書目文獻而言，尼大實難望德里大學之項背。許多因素造就了此現象：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我們的歐洲中心取徑。職是之故，東亞的種種只能得到親疏有間（step-motherly）的對待。其次，圖書館並沒有懂中文的專家；而為了減省經費，校方不會專門聘人為中文書編目。正因如此，尼大許多臺灣、中國所贈的中國研究書刊仍未編目。即便中國和東南亞研究中心有意建立一獨立圖書館，校方也沒有足夠的空間和必要的硬體設備。第三，就印、中大學間的學者和書目資料庫的交流而言，印度與中國的相互不信任，實有礙此孜孜以求的互惠關係。第四，期刊、雜誌價格的水漲船高，也讓很多研究者有心無力。不過，受惠於網際網路，讀者可以在網上找到多數的中文報紙。

（三）獎學金和獎助機會

為中文和中國研究的學生而設的獎學金、研究經費與補助相當稀少。印中文化交流計畫（India-China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只有 25 個名額，而且開放給所有領域。幾乎沒有任何基金會提供研究經費和獎助給中文和中國研究。這一處境可能得以改善，因為臺灣也為有意到臺灣學習的印度學生，提供了每年 25 個獎學金的機會。政府層級的其他交流，則常因阿諛奉承和裙帶關係而蒙上陰影。

（四）以德里為中心的中國研究

無論從教學和研究，還是從資源與獎助來看，印度的中文與中國研究依然是以德里為中心。絕大多數提供中文課程的頂尖大學和機構都在德里，唯二的例外是國際大學和貝拿勒斯印度大學。受惠於印度和中國間貿易和商業活動的成長，印度東部、西部和南部的許多大學也在計畫提供中文課程；這顯然能加強印度全境的中國研究。

14 Sreemati Chakrabarti, "Survey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Chinese Studies in India," in Madhavi Thampi, ed., *Review of China Studies in India: A Colloquium*, p. 7.

有別於中國研究在印度的處境，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在一份 2004 年的調查中指出，自 2006 年起，美國會有 2,400 所中學提供常設的中文課程。歐洲方面，法國在中文學習者的人數上，已超越所有歐洲國家，並有 38 所大學提供學習中文的學程。根據中國漢辦（China National Office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NOCFL，中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現在全世界有超過三千萬人在學中文（程度不一）；此外，有在 100 個國家，超過 2,500 所的大學和學院可提供中文課程。越來越多的小學、中學加入了中文課，諸般中文訓練機構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¹⁵ 中國既是印度最大且不容迴避的鄰邦，難道我們不該投入、加強印度國內的中文和中國研究嗎？

（五）學術出版的水準欠佳

印度的中文和中國研究的產出，其水準仍是一大隱憂。印度的研究在國際期刊上的能見度相當有限。印度有口碑且具審查制度的學術期刊數量不夠。

（六）語言的困難

中文表意系統的起源與發展，和中國文化的演進、發展密切相關。因此，若欲理解中國文化的演進，勢必得精通中文。別說中文非母語者認為它很難了；就連母語為中文的人，可能也會不無驕傲地說它是地球上最難的語言。對中文人士而言，如果一個外國人能在一

定程度上輕鬆寫意地說中文，又能有近於母語人士的腔調和流暢度，是頗難以置信的。這是事出有因的。對外國人來說，中文的書寫是複雜和沒甚麼道理的，因為它不是拼音文字；它的表意符號可以與聲音毫無關係，在本質上和世界其他拼音文字大異其趣。中文有聲調，有許多同音異義、異形的字詞。別忘了還有文言文；如果以為學過三、五年的中文便能閱讀孔子和孟子，那誤會可大了。教學面也有其問題：儘管現在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es）益趨主流，語法學派（grammar school）的理念仍以不同形式徘徊、逗留在課堂上。

五、結 論

印度的中國研究已走過近一世紀的發展，一路上經歷了種種高低起伏。所有人都同意，無論是理解中國，或是強化印度的中國研究，中文所扮演的角色將會益發吃重。1988 年以來的中印外交關係改善，在貿易、文化和學術交流等諸多層面上對雙方都有好處。這一漸趨頻繁的交流也催生出印度的「中國熱」和「中文熱」；但願這種「一窩瘋」（craze）可以相當程度地解決區域研究進入中國研究所產生的問題。然而，它的負面效應很可能會持續下去，甚或加深印度中國研究中當代與傳統中國研究的鴻溝。政府和學術機構應盡快正視本文提出的問題與議題，以求更平實通達地理解我們的友邦。

15 Rong Zhang,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Expands Globally," *China Pictorial* (January, 2006), pp.8-15.

新書評介徵稿

為推動國際學術交流，並讓國內漢學研究者取得國外新書資訊，本刊「新書評介」專欄徵求對外國語文漢學二年出版相關新書進行介紹且兼有評論的書評。文長以 1,000-1500 字為佳，園地開放，歡迎投稿。書評投稿、惠書和有關事物以及提出建議批評等，請與本刊編輯部聯繫：ccsnews@ncl.edu.tw